

NONGCUN SHENGYU LAODONGLI  
WAICHU JIUYE FENGXIAN  
Yujing Yu Gonggong Zhengce Xuanze

#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 预警与公共政策选择

谌新民 ◇著



人民出版社

NONGCUN SHENGYU LAODONGLI  
WAICHU JIUYE FENGXIAN  
Yujing Yu Gonggong Zhengce Xuanze

#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 预警与公共政策选择

谌新民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预警与公共政策选择/谌新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 - 7 - 01 - 011345 - 6

I. ①农… II. ①谌… III. ①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就业-风险分析-中国

IV. ①F323. 6 ②D66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6659 号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预警与公共政策选择**

NONGCUN SHENGYU LAODONGLI WAICHU JIUYE FENGXIAN:  
YUJING YU GONGGONG ZHENGCE XUANZE

谌新民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 25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1345 - 6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

## 前　　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城市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减轻人口对耕地和资源环境的压力，缓解农村的就业矛盾，加快全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农产业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能提高农民的收入，缓解落后地区的农村贫困化，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社会投资提供资金保障。然而，由于传统管理制度的制约与就业政策覆盖面所限和相关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面临着多种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失业、政策变化、实际收入下降、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受损、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的存在及大小决定着农村剩余劳动者外出就业路径及其决策方式。若就业风险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将会降低外出务工的就业收入，以至于抑制转移的速度、妨碍转移结构的优化，从而影响到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和程度，影响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甚至引起公共危机事件的发展以至于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书是在梳理国内外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不断深化、国家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等相继出台，以广东省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反复出现“民工短缺”以及国内劳动就业领域在争论“劳动力短缺时代有没有到来？”论题的背景下，尝试以统计资料以及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以分析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风险因素为切入点，在分别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面临的宏观风险与农村剩余劳动者个体面临的主要就业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状况作出判断。

研究发现，进入 21 世纪，以广东省为代表的沿海地区总体就业环境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进程在稳定的进行。但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失业风险方面，2001—2005 年广东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的就业环境较为良好，总体失业风险有逐步下降的趋势，而 2006 年后失业风险有明显增加的迹象，由于宏观经济的萎缩以及 2007 年与 2008 年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企业裁员破产、劳资争议等矛盾纠纷显著增加，2008 年与 2009 年失业风险有显著增加的趋势。由于中央政府以及广东省省委、省政府都将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作为工作重点，对于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工作在逐步的贯彻落实，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的政策风险在逐年的下降。收入风险方面，从 2007 年城镇物价水平持续的快速增长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预期净收入，需要防范因此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影响；广东省城镇居民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两者的绝对差距大于广东省内的城乡差距，反映广东省的务工收入水平对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依然存在较大的拉力，不过这种拉力的持续性以及力度已经出现一种下降的势头，而广东省内部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导致的城乡收入分配不合理状态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健康风险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作环境中严重的健康风险在不断下降，而各种非严重的健康风险在不断的增大。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以及农民工的维权与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侵权风险在近年将慢慢显性化。此外，分析显示目前农村居民无论是在人力资本投入还是在人力资本存量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风险因素是影响广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上结论表明，相关部门需要警惕“突发性的劳动力流动”，地方政府应有善待农民工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的意识，要充分挖掘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潜力，为经济持续发展储备人力资源，为产业结构的升级赢得缓冲时间。

对于位于珠三角核心区域的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广州市番禺区调研数据的分析表明，调查地区就业环境与政策环境处于比一般水平稍低的位置上，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的外出就业风险处于有风险的位置，外出就业风险的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本地农民的就业意愿较为

强烈，他们认为目前本地企业的就业要求较高，农民就业处于风险较高的位置。问卷调查资料显示收入风险是外出就业风险中的首要风险，工作难找、容易失业是本地农民与农民工认为的第二大主要困难，看病难、看病贵是三个群体共同认为的面临的第三大主要困难，大部分外来农民工虽然不认为在本地就业受到歧视但不安全或者合法权益受损是面临的主要困难。影响本地农民外出就业风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表明，侵权风险的影响较大，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的利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对外出就业风险并且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就业机会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中专教育水平对本地农民的外出就业的影响作用最大。影响农民工跨地区外出就业的风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表明政策风险、收入风险、侵权风险的影响较大，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的利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对跨地区外出就业风险并且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就业机会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具有最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优先选择的转移领域是农村的非农产业，而不是跨地区转移。排序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政策环境越好、对劳动法律越了解、单位购买了保险，越能起到显著降低农民工对转移就业风险评价的作用；而工伤经历与职业病的影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转移就业风险的评价。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似乎已经成为历史而“刘易斯拐点”似乎就要到来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挖掘劳动力供给以延缓劳动力短缺从而工作成本上升的进程，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为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针对广东省统计数据的分析结论，本书提出以下宏观政策思考：（1）应该以政府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部署为契机，树立防范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工作的战略思路和系统理念；（2）在积极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下加大力度推行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政策；（3）建立市场化的劳动用工机制与工资增长机制，监督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4）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安全生产问责制度；（5）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6）开发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系统，尽快将农民工子女纳入我国的正规教育体制；（7）以就业优先为原则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建立健全创业带动就业的长效机制；（8）率先进行深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

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网络。

针对具有珠江三角洲典型意义（产业结构相近以及具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广州市番禺区的案例研究，本书提出以下微观对策建议：（1）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纳入基层党委政府发展战略部署的任务之中，使之成为践行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2）以承载转移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契机，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机结合起来；（3）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所属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有效结合；（4）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工作的不同服务对象，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5）以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结构调整促进沿海地区的城镇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基础构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平台；（6）以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为契机，通过优化企业用工制度，鼓励在沿海地区的企业雇佣更多的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7）大力开展珠三角中等教育与职业培训，突出通过改善人力资源供给来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稳定性；（8）率先进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提供制度保障；（9）完善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平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有利的就业环境；（10）进行制度创新试点，重点推进发展缓慢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将风险管理的范围从金融市场拓展到人力资本领域，从失业风险、政策风险、收入风险、健康风险、侵权风险五个维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进行多视角分析，并构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就业风险模型，识别并估计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要风险因素，以风险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现实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问题；其次，以社会学领域的“风险社会”概念为基础，从制度分析层面拓展刘易斯、托达罗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有关劳动力流动原因和成本理论，深化对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规律的理解；再次，把失业预警机制拓展到就业风险预警领域；最后，拓展公共选择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应用范围，建立政府就业风险管理模型，为降低就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准确的分析工具。

---

---

# 目 录

<b>第一章 导 论 .....</b>	( 1 )
<b>第二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理论综述 .....</b>	( 12 )
第一节 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理论综述 .....	( 12 )
第二节 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的研究 状况 .....	( 22 )
第三节 风险理论的发展 .....	( 31 )
第四节 防范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政策研究综述 …	( 33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37 )
<b>第三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 …</b>	( 39 )
第一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及对策研究分析 框架 .....	( 40 )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指标体系设计 .....	( 43 )
<b>第四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的理论模型 .....</b>	( 65 )
第一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模型分析 .....	( 65 )
第二节 政府就业风险管理框架分析 .....	( 69 )
<b>第五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 .....</b>	( 98 )
第一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基本预警系统 .....	( 99 )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辅助预警系统 .....	( 113 )

## 第六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及其防范（一）

——基于广东省统计数据的宏观分析 ..... ( 118 )

第一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宏观变量与数据  
分析 ..... ( 119 )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对外出就业风险策略宏观变量与  
数据 ..... ( 128 )

第三节 基于广东省 2001—2007 年宏观数据的综合分析 ..... ( 130 )

## 第七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及其防范（二）

——基于广州市番禺区调查数据的微观分析 ..... ( 139 )

第一节 研究变量的描述分析 ..... ( 140 )

第二节 实际调查结果分析 ..... ( 151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162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公共政策选择 ..... ( 202 )

第一节 基于统计数据分析的主要结论与政策思考 ..... ( 204 )

第二节 基于调研数据的分析结论与对策建议 ..... ( 214 )

## 专题研究之一 农民工转移就业风险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微观基

础研究——来自广州市番禺区的发现 ..... ( 226 )

## 专题研究之二 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再估算和解释 ..... ( 251 )

## 专题研究之三 30 年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化进程差异与动 力替代——基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视角 ..... ( 262 )

## 附录 1 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 ..... ( 271 )

## 附录 2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 ( 283 )

## 参考文献 ..... ( 287 )

## 后记 ..... ( 300 )

---

---

# 第一章 导 论

## 一、研究背景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体：一方是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另一方是相对比较强大的城镇工业。改革开放前中国人为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造成改革前城乡关系以及导致城乡收入和福利巨大差距的制度安排中，阻碍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政策及其执行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传统发展战略得以推行，一系列造成城乡关系扭曲的制度环境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蔡昉等，2003）。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为生产要素流动创造了条件，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城市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据统计，1994年中国农民工数量6000余万人，2000年达到8840万人，2003年1.14亿人，而到2005年已超过1.5亿人，2011年达到2.3亿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减轻人口对耕地和资源环境的压力，缓解农村的就业矛盾，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大量必需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农民工虽然来自广大农村，总体也流向四面八方，但其流动轨迹还是集中体现以下特点：一是由农村流向城镇，二是由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三是由内陆地区流向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在2004年以前又以集中流向广东等沿海省市为显著特征。2004年以后，由于民工短缺现象的出现，民工流向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以第三代农民工为主体由主要流向广东等沿海

省市转为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等地区并存，二是随着内地工业化程序的提高，第二代农民就近转移到城镇的增多，三是在利农政策鼓励下，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务农的比重增加。<sup>①</sup> 农民工流向的变化折射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收敛，这与都阳与蔡昉（2004）利用制造业工资数据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趋势的结论一致，而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全国各地农民工的拉力作用出现下降的趋势。

近些年来，中国劳动就业领域引人关注的话题就是“劳动力短缺时代有没有到来”，话题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农民工的供给是否已经出现短缺。从2007年起蔡昉教授从人口结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等角度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并作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sup>②</sup> 李实教授肯定了蔡昉关于中国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征兆的看法，但认为中国这一转折应该是一个区间，目前只是开始进入这一“转折区间”，在这一时期需要警惕突发性的劳动力流动（李实，2007）。陈静敏等认为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由短期内的一些供求因素引起的，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时代（陈静敏、陆铭、陈钊，2008）。随着城市化比率的快速提高，以及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状态走向结束，中国“劳动力短缺”时代的到来时日尚早（孟昕、陆铭、陈钊，2007）。

然而，学者们较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宏观供求关系上，而对于在当前体制和经济环境下微观个体劳动者的经济选择行为对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影响却关注较少。本书认为，对于目前体制和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需求趋势与就业行为的判断，还需要深入探寻其外出务工的动因及其风险因素。一方面，近年政府持续出台惠农政策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相对收益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多种风险有增无减，当前经济环境下，两者共同作用会降低农村剩余

---

<sup>①</sup> 谌新民：《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有新视角》，《南方日报》2006年2月8日。

<sup>②</sup> 详细可见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国内持相同观点的学者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蔡昉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7）一书中。

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意愿进而影响劳动力的真实供求状况。本书主要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外出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如失业、保障缺失、健康受损、欠薪、侵权、教育不公平等风险因素若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将会大大抑制转移就业的速度、妨碍转移结构的优化，从而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并加快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更有甚者，如果处理不当，可能由于部分人的不满情绪与群体性事件而引起公共危机事件，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因此，识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风险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价，有助于理解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与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微观基础，并据此提出相应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外出就业的政策建议，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进而延长其竞争优势，以防范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常流动的现象，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过程中个人、企业、政府可能遭受的风险的发生概率，达到预防公共管理成本上升以及社会危机事件出现的目的。

## 二、研究思路

近年来，各地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改革发展事业全局，要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此外，改革开放以来 11 个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问题为主题，表明在新形势下如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而农村劳动力如何有序合理地转移到非农产业无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突破口。本书以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就业风险为切入点，主要以广东省为案例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的预警与公共政策选择。在梳理国内外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不断放大、国家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劳动合同法》以及《就业促进法》和《社会保险法》等相继出台、实施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和转移以及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战略、沿海地区普遍发生“民工荒”以及国内劳动就业领域在争论“劳动力短缺时代有没有到来？”论题的背景下，尝试以统计资料以及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在分别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面临的宏观风险与农村剩余劳动者

个体主要面临的就业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对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状况作出判断。首先，在总结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及对策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失业风险、政策风险、收入风险、健康风险、侵权风险五个层面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并且把农村劳动力理性应对外出就业风险的行为分为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的利用以及从事本地区非农活动（就地转移），并提出政府管理外出就业风险的理论框架；接着是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模型以及政府就业风险管理模型，并且结合广东省的统计数据以及广州市番禺区的实际调研数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是构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预警系统，把传统的失业风险管理机制拓展到就业风险预警领域；最后，在总结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主要从政府层面提出相关的公共政策选择建议。

### 三、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由于农村存在数量巨大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制度障碍改革的不彻底，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的外出就业在不同的改革阶段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实现从主要依靠常规生产要素的投入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的转变，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如何有序有效地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是理论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从政策层面上看，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作用开始慢慢显现，工人的维权意识进一步的加强，一些用工制度与工资待遇较差的企业相继出现经营亏损甚至倒闭的现象。从宏观经济形势上看，2008年中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海啸现象和目前正在上演的以欧债危机为表征的金融危机已经逐渐的影响到实体经济，全球产品需求急剧放缓，对于以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一些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企业纷纷倒闭，可以预计，作为派生性需求的劳动力需求将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从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

现状看，广东省（主要是珠三角地区）是沿海地区最早发生“民工荒”的地区，从2004年开始广东省每年都出现民工短缺的呼声，民工短缺严重影响着企业的正常生产过程。从地区劳动力需求结构上看，尽管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内地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在劳动力需求上加剧了与珠三角的竞争，但广东省依然是全国劳动力的主要吸收地。据广东省职业介绍中心的有关数据显示，广东省实际管理人口数全国最多，2007年常住人口达9449万；广东省外来流动就业人员数量全国最多，达1900万人，超过上海（450万）、江苏（400万）和浙江（700万）三省市之和。2007年底，广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为50.3%，低于江苏的62.4%、上海的64%，更低于浙江的70.1%。以上分析表明，在劳动力出现局部短缺并且短缺在进一步加剧、产品与劳动力需求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的形势下，广东省面临着如何适时调整经济结构并有效促进本省与外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就业的艰巨任务。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书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在国内劳动就业领域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即将到来”的论题以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逐步恶化的背景下，以广东省的现实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状况为基础，通过深入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规律，重点研究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风险因素，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探讨农民工如何规避外出就业风险、企业如何规避用工风险、政府如何预警与管理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等问题。以分析结论为基础从政府政策与管理风险的角度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对于预警与防范可能出现的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地区就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其他地区如何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外出就业问题也有借鉴意义。

而本书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风险管理的范围从金融市场拓展到人力资本领域，从失业风险、政策风险、收入风险、健康风险、侵权风险五个维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就业风险的实证分析，识别并估计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要风险因素；其次，从制度

分析层面拓展刘易斯、托达罗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有关劳动力流动原因和成本理论，深化对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规律的理解；再次，把失业预警机制拓展到就业风险预警领域，对于风险管理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外出就业风险，主要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采取预先防范的管理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不利后果的发生，规避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最后，拓展公共选择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应用范围，建立政府就业风险管理模型，为降低就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分析工具。

## 四、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确定

### （一）农业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

农业是一种产业部门，是相对于工业、商业、运输业等非农产业部门而言的。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具体包括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与副业的劳动者。而农村是一个空间地域概念，是相对于城镇而言的。农村劳动力是指在农村范围内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包括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本书主要关注的农村劳动力，是指年龄主要集中在 16—60 周岁，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地区的从事不同产业的劳动力。

###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

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刘易斯（1954）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经典定义，他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标准衡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程度。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 和 Fei，1961）也将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ur*），同时将边际生产率小于平均产出或不变制度工资（相对于生存收入）但大于零的劳动力称为过剩劳动力（*surplus labour*）或隐蔽失业劳动力（*disguised unemployer*）。乔根森（Jorgenson）否认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假设农业产出只是劳动的函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劳动剩余）的存在。当人均粮食供给率大于最大人口增长率时就会产生农业剩余。纳克斯（Ragnan Nu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提出在不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中存在隐蔽失业的

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中即使农业技术不变，可以抽走很大一部分从事农业的人口而不致降低农业产量。郭熙保（1995）提出“地—劳比率变动”，“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现下降趋势时，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取决于劳均耕地。侯鸿翔等（2000）认为，剩余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构成失衡，劳动力供给超过由生产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出现的低效用或负效用现象。侯风云（2004）认为衡量劳动力“农业剩余”和“农村剩余”规模的标准是务工收入与务工收入的比例，当地务工、经商与外地务工、经商的收入比例，以及地区发展的差别和城乡收入差别。程名望（2007）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在农村传统部门存在的超过实际生产需求的劳动力即隐蔽性失业及实际工资率低于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力。具体表述为：在一定时期，一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特定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劳动数量（潜在劳动供给能力）与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最低劳动投入之间的差额即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本书所界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程名望所定义相近，即在农村传统部门中存在的超过实际生产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实际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取决于当时的区域农业生产技术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动态和相对的概念，随着区域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而变化。

### （三）农村外出就业者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的逻辑起点是劳动力流动（迁移）。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迁移）的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空间，流动总是意味着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这意味着在一定距离上的地域改变；（2）居住地，迁移总是伴随着常住地的改变；（3）持续时间，迁移也可以被定义为在某个地点度过了某段时间，或者在某段时间中离开了某地；（4）某个其他特定的标准，如工作地点的改变、户口登记地的改变等。在实际操作中，迁移的定义时常是若干个标准的组合（朱农，2005）。Ma等（1997）指出中国目前的人口迁移主要有三类：一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这主要是流入城市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通常为城市的暂住人口，他们构成了乡村向城市（乡—城）人口迁

移的主流；二是教育迁移，这是农村中素质较高的年轻人，通过就学的方式进入城市，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一般均能在城市获得永久性的职业；三是婚姻迁移，主要是农村女性为改变自己或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婚姻的方式进入城市地区，其目的地主要是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分析起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transfer），一般可分为产业转移（由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和地区转移（某一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另一区域转移），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是：“凡是在一年之内从事非农劳动累计时间达到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都划为农村转移劳动力”。

而本书把研究对象界定为“农村外出就业者”，其定义与杜鹰等（1997）对“农村外出就业”的定义相类似，即：（1）不包括以探亲访友、旅游、治病等为目的的农村外出人口；（2）在农村外出就业者中，以常年外出就业者为主；（3）农村外出就业者主要是指到本村以外的城镇从事非农活动的就业人员，也包括少数就地转移到本村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农村外出就业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农村外出就业者相近的一个概念是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学者们通常将农民工定义为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杨思远，2005）。他们的户籍身份是农民，在农村留有承包的土地，但他们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劳动，就其职业来说已经是工人。本书认为农民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包括部分未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如失地农民），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把农村外出就业者等同于农民工。

####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指出，劳动力的流动（迁移）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迁移存在着一种预期收益，即迁移者因预期迁移在更佳机会中所能得到的更多收入；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劳动力的流动是流动主体对流动前后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决策，由于经济主体在做出流动或不流动的决策往往是建立在自身对成本收益判断的基础上，而且由于每个决策者自身的知识与文化素质、判断能力和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这种决策往往带有不确